

# WO ZHIDAO SHENM



我 知 道 什 么 ?

## 法 国 大 革 命

F.布吕什

[法] S.里亚尔 著

J.蒂拉尔



我知道什么？

# 法 国 大 革 命

F. 布吕什

[法] S. 里亚尔 著

J. 蒂拉尔

冯 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法)蒂拉尔著;冯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631-8

I. 法… II. ①蒂… ②冯… III. 法国大革命(1789~1794) IV.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728 号

我知道什么?

法 国 大 革 命

F. 布吕什

[法] S. 里亚尔 著

J. 蒂拉尔

冯 棠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ISBN 7-100-02631-8/K·554

---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5/8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F. Bluche, S. Rials et J. Tul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roisièm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2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三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 《我知道什么?》丛书

##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3000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 目 录

第一章 前大革命.....	1
第二章 八九年 .....	17
第三章 八九年精神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	42
第四章 结束大革命? .....	70
第五章 君主政体的覆灭 .....	89
第六章 共和国.....	105
第七章 恐怖政府.....	118
第八章 结束大革命.....	144
结 语 .....	159
注 释 .....	163
参考书目.....	167

# 第一章 前大革命

1789年，大部分为农民的2 800万法国人生活在君主制度下。加佩王朝统治已有800年。法国是个“组织起来的”国家：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前两者是特权等级——由（行业的、居民的）团体和共同体连接。尽管这样的结构必然具有不平等和阻滞，路易十六的王国相对而言还是富裕的，然而人人都在不同意义和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改革的必要。尽管启蒙运动的真正思想只是在狭窄的读者圈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却在沸腾（见第三章）。这些思想观念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当一些人或另一些人要求改革时，他们所谈的并不是一回事。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要君主制度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君主制度无疑不再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所有改革的微弱愿望都遭到竭力反对，尤其是特权阶级的竭力反对；然而事与愿违，挑起争论的那些人竟充当了行将到来的大革命的引爆者。财政危机刻不容缓，就要拔去君主制度的门闩，以难以预料的方

式导向胜利，使财政危机彻底解决，这与启蒙运动的初衷相符，只是方法欠善。

## 一、君主制国家的危机

1789 年的法国苦于多种弊病，首先是政府的软弱无力。

**1. 绝对君主制** 波旁王朝君主制度可谓绝对君主制，即纯粹而不受束缚的君主制。在理论上，一切来自国王并追溯到国王；国王考虑的只有上帝；法律出自国王唯一意志；一切司法裁决均以国王名义作出。但是现实更为复杂：法国君主制度不受束缚，可并非没有限制。这在几个世纪过程中，已由基督教传统习惯法所确定下来。至于国王有名的“神权”，至少在精英们的精神中，乃是日益使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相分离的时代的牺牲品。国王再也不能独掌天下；他要由枢密院的大臣和不同机构襄助（“枢密院”自中世纪以来是法国君主制度基本的动力之一）。

**2. 行政活动的重重障碍** 中央集权虽在发展，但极不完善。它的象征代理人，司法、警察和财政总

督，并没有支配一个有足够的官僚机构；在他的财政区，总督与居民的，尤其是与地方精英们的特殊利益相抵触，而总督往往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地区的多样性与王国的统一相对立。方言和土话继续存在。法律的统一很久以来就在进行当中，但十分缓慢；在南方以“罗马法”为主，而在法国北方则是习惯法，有差不多 300 种不同的习惯法。度量衡因省而异，捐税的分摊同样也各省不同。内地的税卡减低了商品流通的速度。

国王代理人行动的主要障碍是几个世纪过程中特许的各种特权——省特权、城市特权、等级特权、团体特权、个人特权。正是因为法国是一个“布满特权”的国家，法国才又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为数极大的政府公职为了祖先遗产，使得奠基于“官吏”之上的君主权力陷于瘫痪，处在大肆割据独立的局面之中；已经走到封建制度穷途末路的国王，听任这种使国家权力四散分解的新形式自由发展。

比起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法国国王更无人服从，这些“开明暴君”更不尊重传统，更加粗暴地运用那些从路易十四那里模仿来的统治方法。

**3. 路易十六** 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加上路易十六的性格。法国缺少一个有力的君主，权力的缰绳

飘荡着。路易十六 1754 年生，他是给未来国王准备的费奈隆式的愚蠢教育的牺牲品，路易十五的这个孙子严重地缺乏意志与自信。他仁慈、宽厚、非常虔诚、一心行善，1774 年 19 岁时违心登上王位。初时的热情一过，他就陷入失望。他的愿望既是保守的又是进步的，表现出来时而坚定时而软弱，摇摆不定，宫闱内部政治阴谋乘机而起，他受其左右，气量很小。

至于王后洛林—哈布斯堡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公主有几分高傲——尽管丝毫不尚礼仪——由于年轻而明显轻佻，她受到七年战争以来横行的反奥地利偏见的损害。有名的项链事件<sup>(1)</sup>（发生于 1785 年，她在这一事件里是完全无辜的）和形形色色的愚蠢行为，使她成为“舆论”谴责的众矢之的。那些揭露出的丑闻，往往以色情方面的诽谤性文字凌辱王后，并且更笼统地攻击国王周围的人，这不仅仅败坏了政治权力的声誉，而且使整个旧制度名声扫地。

**4. 致命弱点：高等法院** 从 1774 年 11 月恢复高等法院起，路易十六无疑犯了一个错误。高等法院是裁判法庭（通过推选产生），自诩为法律捍卫者，利用注册权和谏诤权试图控制王国政府。法官是根

据官职遗产占有官职者，这样的高等法院成员同样声称“代表”国家。高等法院的反对与冉森教派的不满部分地混合起来，毒害了路易十五下半期的统治；1771年，掌玺大臣莫普用公务员化的官员取代了高等法院成员，预示着近代法官的产生。路易十六恢复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显得更加镇静，但在以后要恢复活力。高等法院成员用人道主义的长篇大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掩饰替自己特权的辩解，因为年轻的法官是进步主义者，有些还是先进的才智之士，高等法院成员将使有益的改革付诸东流，将激起反抗经常设法改善法国人处境的“专制政府”的起义，这样就将大革命越推越近了。

## 二、旧制度社会危机

**1. 封建制度还是贵族国家？** 旧制度下的社会是个极端复杂的社会；反差、矛盾和反常现象控制着这个社会。1789年，行会主义的地方主义仍然难以消除，但是源于中世纪的三个等级——僧侣、贵族、第三等级——的传统划分已丧失了大部分合法性。

专制主义国家并不是所谓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延伸部分，这样的延伸部分可以在自中世纪以来未

发生变化的制度上嫁接。这种既不完善也不完整的国家适应许多古风，诸如土地的“封建”法规，并且为了领主的利益容许领主势力较小地进行某些割据。封建制度在法国很久以来即已灭亡；封建封臣的古老关系是中世纪社会的动力，从此以后则占着最次要的地位；地主的势力在封建时代领主杂税的形式下大为减弱，尤其是在定期收益方面；故而，对于 18 世纪的法国，最好说它是一种衰弱的封建领主制度，这种制度在国家时代已无法自我协调了。

另一种古风：这同一专制主义国家，在启蒙世纪的下半叶，听任贵族代表来支配。据此观点，大革命以前的特点是封建领主向贵族退化。夏托布里昂清楚地注意到：“贵族有三个连续的时代：优越时代、特权时代、虚荣时代；脱离第一个时代，堕入第二个时代，消失于最后一个时代。”正是这样，崇尚贵族阶级及其想像中的生活方式的趋势，在许多寻求社会晋升的资产者中长盛不衰，在同怀疑斗争的某些贵族中激化加剧。

2. 精英 在身份地位的明显或真实的划分和无数差别的外面，存在着相对的同质性，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精英分子至少存在客观的利害一致，这些精英分子几乎是唯一最易受启蒙运动知识信息影响

的人，而土地所有者这一类人占主要地位。

面对王国的社会演变，君主制度的愚蠢行为不胜枚举。路易十四在投石党运动之后已知道制服上层贵族，使上层贵族乐于服役，同时通过敕封贵族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得以晋升。路易十六在贵族的反动这一整个时期，过分地厚待“他的”贵族阶级。上层教士、高级法官、“摇笔杆”的行政贵族、大金融家集团几乎清一色都是贵族。在军队中，塞居尔的改革（1781年）为了常常贫困的旧贵族（四个亲等）的利益而压低新的平民出身的贵族。然而贵族的活力却属于另一方面；与古老的血统无关，贵族的活力体现在例如经济领域，贵族加入股份公司，加入航海贸易，投身化学、冶金、矿产、纺织。

波旁君主制度不再会管理精英。他们当中很大部分最终失去了对社会制度的信心，或认为能够利用君主制度的衰弱，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这些精英几乎不再相信旧制度占社会优势的合法性——宫廷的精华 1784 年为博马舍《费加罗的婚姻》中大段的反君主制反贵族的独白鼓掌——但他们引而不发……

内部矛盾影响知识潮流，同样影响个人潮流。“贵族自由主义”这种变化把费奈隆、圣西门、布兰维利埃（甚至于巨匠孟德斯鸠……）都一股脑罗列进

去，一部分不容忽视的对现状不满的贵族与之有联系，“贵族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它的反专制主义有时使它成为真正的政治上的勇敢者；它的反动的一面更使它步入所谓“日耳曼人政府”的考古学道路，而没有走上自由哲学的道路。

资产阶级的发展不是持续上升的；自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就不断更新。在启蒙运动时期，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一成不变，而另一些资产阶级的活力则可与一部分贵族阶级的活力相匹，这同阻止资产阶级上升的、在法律上被固定下来的社会的严重僵硬形成对照。

法国资产阶级还不如贵族阶级那样清一色。在最顶层是极上层金融资产阶级：包税者和包税人（至少是尚未敕封贵族的那些人），他们的豪华排场伴随着对精神事物的偏好。在上层资产阶级中，尤其列有因三角贸易（南特、波尔多、拉罗谢尔）致富的大船主。然而人们要注意，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相对来说，贵族大资本家多于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在制造业（煤炭、冶金、纺织）领域，尽管有一定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坊和小企业仍占优势（工业革命远不如英国先进）。最典型的上层或中层“旧制度资产阶级”乃是法律界的和占有土地的，是事务所和土地的所有者；这个资产阶级的最重

要部分向往贵族阶级，憧憬“贵族生活”。最后，在资产阶级阶层的底部，店铺和手工业者的“人民资产阶级”（引 A. 多马尔语）与小民百姓相联系，构成城市第三等级的下部边缘（手工业行会集中的工人、仆人、散工、街道小手工业）。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上层精英的关系渗透之外，许多第三等级成员身上存在一种共同感情，失望和敌视“贵族偏见”（引里瓦罗尔语）更甚于敌视国王或大臣的“专制”。巴纳夫、罗兰夫人或罗伯斯庇尔年轻时蒙受的耻辱是无法原谅的耻辱，尤其是当人们感到自己胜过侮辱你的人的时候；这时失望就会转变为仇恨，而思想团体的实践所传导的法律平等主义在某些人身上便会具有激进的内涵。倘若外省资产者比人们以为的更保守，在接受启蒙运动影响上表现不一，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的小资产者就更易接受“文学投石党人”的诽谤性文字（见第三章）。

从知识方面讲，这多种多样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是“知识渊博的”精英中最先进的部分。他们对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看法通常是非宗教化的、理性化的，与多数人常常是非理性的观点形成对照。这些精英信仰理性，相信进步，要求得到幸福的权利，在陈旧过时的法律束缚面前怒不可遏。对精英来说，劳动的

价值高于战争(并常常高于祈祷)的价值;他们拒绝特权和社会依等级划分,他们渴望起政治作用。

**3. 人口统计与社会危机** 经济萧条打击着一个人口飞速增长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因素——技术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卫生的进步和大量瘟疫的消失、也许还有气候——自半个世纪以来结束了旧式的人口统计。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人的寿命延长,出生率一直增长。1740 年到大革命之间,法国人口有规律地增长,居民从 2 400 万增加到 2 800 万以上。然而,在 17 世纪 80 年代达到成人年龄并走上劳动市场的几代人,则碰上了法国在过去人口很少时的那种固定的结构。在农村,收成丰歉没有把握,中等农民有一部分处于社会边缘,这种情形在城市里也一样:行会制度和生产性投资短缺,妨碍了企业的发展,年轻人看不到就业扩大的可能,失去社会地位和失业者的人群常常在增加。

**4. 经济危机** 70 年代期间经济欣快症结束,逐步让位给“收缩间歇周期”。

在农村,由于地租增高,对土地赋税实行簿籍审核(但这并非新做法),以及对农民的某些集体性习惯做法进行重新审理,气氛变得十分沉重。正是在